

劉揚忠 學術論文集

王沁鵬題

上卷

學術論文【上册】

扬忠先生是当代杰出的学者、诗人、教育家。他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华诗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研究生培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刘扬忠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劉揚忠 學術論文集

王必鵬題

LIUYANGZHONG XUESHU LUNWEN JI

下卷 學術隨筆及其他

劉揚忠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下卷 学术随笔及其他

为柳永说几句话

读晚报《百家言》栏《宋仁宗为何不用柳永》一文,感到非常惊讶。

我不知道该文作者是否分析过柳永的全部作品,以及是否将柳永与其前前后后的作家作过认真比较。一部《乐章集》存柳词近二百首,难道竟全是“有腐蚀作用”的“淫歌艳曲”和“浮艳虚薄之文”吗?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柳永对宋词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创制长调慢词,大量采用民间俚语俗辞入词的作家。他第一个将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写入词中,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在词作中,有对祖国美丽河山的赞美,有对繁华旖旎的城市风光的描绘,有失意士子的牢骚和哀愁,有真挚爱情相思的咏叹,赢得了当时普通民众的喜爱,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柳词的产生是宋词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革新,具有进步的意义。岂能因为其中有一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免的糟粕,而作出柳永“传播颓废文化”的偏执结论?柳永那首流传至今的诗作《煮海歌》,就是一篇反映海滨盐民的疾苦,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欺压的现实主义杰作。这样的人民性很强的作品,正是对那个所谓“有真知灼见”、“打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宋仁宗统治的有力控诉。

柳永被贬斥的原因是什么?该文作者说是宋仁宗要“净化文化”,反所谓“腐蚀”。这是对封建皇帝的一厢情愿的美化,没有事实根据。宋仁宗并非作者想象中的正人君子,而是一个及时行乐的太平皇帝。他耽乐后宫、嫔妃争宠,丑闻不少。事实上,史书上也没有什么宋仁宗要“净化文化”的记载,有的倒是他们压抑和摧残人才的许多例证。就如《能改斋漫录》上那条记载,倒是恰好说明了柳永被黜的真正原因是,他违反封建的虚伪礼教的作风使执政不喜,而他敢公然吟出桀骜不驯的《鹤冲天》,这更惹怒了皇帝。如此而已!

他的《醉蓬莱》写到“太液波翻”,更使希望吉祥如意长治久安的皇帝不喜,道是“何不言太液波澄?”原来他犯了仁宗的忌讳。因此他再次被黜。

我国封建社会的文人都有诗酒风流、狎妓宿娼的经历,连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都未能免俗。不少人甚至将这一部分生活写入了作品中。唐诗宋词中都不少见。对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现象,要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其中确属色情和玩弄女性的糟粕,要进行批判和剔除。但古代作家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往往很复杂,应该按鲁迅提出的顾及全人和当时社会状态的要求,对他们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不能执其一端,任意褒贬。

【《北京晚报》1982年5月27日第3版“百家言”栏目,后收入该报编辑部编《百家言》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

历史人物岂能胡编

晚报《百家言》栏的《李清照欣赏苏轼的词么?》一文,对某些作品塑造李清照形象时违反历史真实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我对此深有同感。

当今舞台和银幕上的李清照形象,不真实的程度是颇为惊人的。不仅有关于李清照文艺观方面的不真实,还有对史实的歪曲。例如电影《李清照》,编导者不是充分地占有历史资料,进行合理的剪裁、想象、补充和虚构,以求真实地再现历史上那个优秀的女作家的形象,而是单凭热情和幻想来进行创作。其结果,李清照和她周围的人物被弄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些不可信的、不知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模糊人物。历史上的李清照,并未有反封建包办婚姻的壮举,电影却编造了家长阻婚,李清照、赵明诚坚决反抗,双双离家出走的情节,俨然把主人公拔高为“五四”之后的新青年。又如,为了歌颂李清照,不惜毫无根据地丑化张汝舟,把他任意地涂改为北宋末年的恶少,南宋初年和秦桧一样的大奸臣。历史上的赵明诚和张汝舟,本都是官微言轻、不足参定朝廷军国大计的人,编导者却硬让他们在宋高宗面前进行激烈争辩,一个代表抗战派,一个代表投降派,而且头等重要的迁都大计,竟因张汝舟的主张而决定下来。这样,电影中的赵明诚竟成了与李纲一样重要的大英雄,张汝舟则

“取代”了秦桧,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历史上的赵明诚明明是病死的,编导者却硬叫他被“坏蛋”张汝舟气得吐血,不治而亡。如此等等。似乎不拔高一些人,贬低一些人,不加以杜撰就写不成这个剧本。对这些,许多观众和读者是议论纷纷的。

我以为,只有忠实于历史,才能塑造出真实感人的历史人物形象;而实事求是的批评,才能促进历史题材的创作。末了顺便指出,《李清照欣赏苏轼的词么?》一文中,所引“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二句,作者注明是“向子湮语”,误。这是南宋初年胡寅的话,见胡寅的《向子湮〈酒边词〉序》(或称《题酒边词》),不是向子湮本人的话。“湮”应为“譔”,又“如教坊雪大使……”一段引文,“雪大使”应做“雷大使”。

【《北京晚报》1982年8月17日第3版“百家言”栏目】

李后主这个人

历史上有些人物,仔细探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享钟鼎之贵”,“乐日月以优游”。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君国大事一窍不通,只懂得研习文艺和纵情声色,以致还在其兄太子弘冀夭亡,中主李璟议立太子时,就有人上书攻击李煜“器轻志放,无人君之度”。当时南唐由于北敌压境,内政不修,国势日弱,李璟已发出“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哀叹,而身居东宫,已被令参政的李煜却只热衷于设崇文馆以招文士。后来他在风雨飘摇中继位,不能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只知卑辞厚币,年年向宋太祖进贡,以求苟安。与此同时,他将帝王治国的工夫几乎全用来治文学和图享乐。大臣在他面前议论政事,他竟然掩上耳朵。连弟弟从谦也讥笑他是“尽日竟沉吟”的“竹林君子”。

宋军围金陵,他同朝官“君臣相持,暗呜泣下”,不知计之所出。城破之日,他竟还在静居寺听和尚讲经,仓促中肉袒出降,身辱国亡。最后,他仍因不懂得政治上远祸全身的道理,招致宋太宗猜忌而遇害。

与政治上的昏聩糊涂相反,李煜在文学上却大放异彩。他本是文艺上的

多面手,工书善画,洞晓音律,诗词文赋皆精,尤以填词为当行本色。国破家亡的惨剧,更成全了文学上的李煜,使他获得了当小皇帝时不可能有的创作源泉。他的后期的词,撑破了“花间”的藩篱,开宋词风气之先,他甚至被人尊为“词中之帝”。其贡献恰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有人曾说,正是李煜后期生活才使他在文学上成功。这话没错。的确,由皇帝变囚徒的屈辱,迫使他体验到常人不能体验的生活滋味,取得了创作的素材。但是,仅是如此,还不足以使他成为大作家。因为同样是亡国之君,汉献帝就不作诗,刘禅就只会傻乎乎地说“此地乐,不思蜀”。被宋朝逐个降服的五代末各国君主也大多不以文学显。应该承认“诗有别才”。李煜因为长于形象思维,富有文学素养,才可能将后期的遭遇概括提炼入词,写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优秀篇章。后人悼惜他“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是有一定道理的。

【原载《北京晚报》1982年10月28日第3版“百家言”栏目】

给金代文学应有的一席之地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人们充分重视辉煌灿烂的两宋文学,这是完全应当的。但与南宋文学同时并存的金代文学长期被看作冷门,这却不合情理。金代文学研究是否真的已无事可作?金代文学的地位是否低微到只有个别作家与作品可称道?我以为不然。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金代文学未能取得像同时期的南宋文学那样大的成就。再有,由于金源一代文献大量散失,使得我们无法按金代文学的原貌来对它下结论。因此我们的文学史或其他论著给予金代文学以相对少的篇幅,我们对之部署较少的研究力量,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决不能因为上述理由将金代文学视为南宋文学的附庸,或甚而用南宋文学来并吞和代替金代文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洵非虚誉。既然十二世纪初到十三世纪前半期这段中国史,主要是由宋金两个对峙区域的活动(包括文学活动)及其相互的交往、斗争所构成,那么,当我们总结和书写这一段文学史时,理应将成绩斐然的金文学与南宋文学置于平行的地位来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才能对这一时期的全中国文学史(而不单单是南宋文学史)得出更为完整和准确的结

论。

为了改变人们对金代文学的概貌、特征及价值知之甚少的现状,除了期望出版部门整理印行金源文献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亟待进行。首先,改变过去只注目于元好问、王若虚、《董西厢》等少数作家与作品的情况,把我们的眼光移向金代文学的全局,通过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探索,从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和代表性作家入手,为这一代文学理清发展线索,找出规律性,进而写出详细描述这一特殊时期和特殊地域的文学史的科学专著来。

其次,开展对金与南宋文学的对比研究。就以诗词而论,作为一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北方汉语文学,金诗金词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情趣或表现手法上,都与南宋文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呈现出与后者争辉的夺目光彩。就这种独特性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不亚于南宋文学。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将有利于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全局和规律。

再次,从文学研究适当扩大到历史学、民族学领域。金代文学,本质上是汉语文学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延伸和发展。金代作家中除了完颜亮、完颜璘、耶律履、术虎邃等等是少数民族外,其余大多是汉人。就是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也全都是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如果我们能在正确说明汉语文学在金代的独特形态时,探索这种文学在非汉族统治区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大家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并尝试总结这类史实(元、清二代也有)所反映的规律性,那么我们就为其他兄弟学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和观点,其意义就远在单纯的文学研究之上了。

【原载 1984 年 11 月 13 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周刊】

宋太祖称“武德”实有所本

晚报《宋太祖不应称“武德”》一文,认为将赵匡胤称为“太祖武德皇帝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问题。”这个批评失之武断。

用年号作为皇帝的代称,是清明两代的事,因明清的各代皇帝,大多是一个年号用到底的,故以年号代称,极为方便,不会混淆。而明以前的各朝帝王,在位期间大都屡更年号,故史家一般不用某一年号来代指他们,而是称其庙号。称赵匡胤为太祖武德皇帝,是有所本的。赵匡胤出身军人,以武力得国,又以武力扫平国内众多割据政权。他在世时就被百官尊为“神武明道至德皇帝”,开宝九年去世后,又被谥为“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尊号以“武”为标志,说明宋人对他的武功的肯定。“武德”即为其尊号的省称况且他的庙号是太祖,称之为太祖武德皇帝,决不会与庙号为高祖的唐皇李渊混淆起来,何来的“张冠李戴”呢?

【原载《北京晚报》1985年2月11日第3版】

淹贯文史、认真耿直的吴世昌先生

吴世昌先生 1908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一个贫民之家。他自幼迭遭磨难：八岁丧母；十岁丧父；接着又患眼疾而左目失明；小学没念完，便被亲戚送到杭州一家商号当学徒。但他一心向学，白天做工，晚上偷空读书。17 岁时考入嘉兴教会中学当工读生。20 岁时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七年间，他先靠写稿挣钱，后靠成就优秀获得奖学金，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他虽然读外文专业而治学兴趣在中国文学史，本科二年级时就在《燕京学报》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释〈书〉〈诗〉之“诞”》。此文在当时引起学界轰动，胡适撰文加以赞扬，并把吴先生和杨树达、丁声树一起列为当代研究古代经书有成绩的三人。1935 年，刚从研究所毕业的吴先生应顾颉刚先生之聘，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编辑，走上了专攻文史的道路。

吴先生在北平求学和工作的十年间，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吴先生一面发愤读书写作，一面积极参加北平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以后，他和他的哥哥著名历史学家吴其昌南下呼吁抗日，兄弟二人登上南京中山陵，为国土沦丧大哭一场。此事经报纸揭载，吴先生名贯南京和北平，遂被选为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此后他常常领导该校抗日活动，曾任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

讲师,广东中山大学、湖南国立师院教授,桂林师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日本投降后,他随中央大学迁返南京。1947年底,吴先生应聘到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及甲骨文等多门课程。旅英期间,他用英文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红学研究代表作《红楼梦探源》,此书在海外汉学界影响极大。

1962年秋,吴先生放弃海外工作和生活的优裕条件,毅然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文革”十年,他饱受冲击,被迫终止了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年逾古稀的吴先生焕发精神,重操旧业,并且担任了培养研究生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兼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社会工作较为繁重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专业著述,常常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直至1986年8月31日溘然长逝。

吴先生一生勤苦治学,著述颇丰,并且富有个人的学术品格。自学入门的艰辛历程,养成了他认真倔强的个性、一往无前的进取心和炽烈的求知欲,而这种绝无师承、在多方摸索和博览群书中闯出路子的曲折经历,恰好助成了他综合性的知识结构和淹贯文史、不专主文学一科的广泛兴趣,使他在“国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他在学术界主要以红学和词学知名,但实际上他在历史学、民俗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等等方面都有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值得强调的是,他从教会中学入教会大学,从英文专业转向攻入中国文学史之门的独特学历以及旅居英伦十五载、长期执教西方名牌大学的海外生涯,使他有较多的机会吸取西方先进理论和方法,来从事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因而他的著作往往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学术个性十分鲜明,可谓自成一言之言。他的文学史著述,除了早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等专书之外,还有专题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多篇。近年来,他的学生和亲属将这些文章编辑而成《罗音室学术论著》四大册,前三册已经出版,第四册也即将出版。吴先生还是一位颇有才气的诗人,他的诗词结集《罗音室诗词存稿》,1963、1984年曾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两次出版。

“十年磨剑”与“为稻粱谋”

钱先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品格非常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自身的不懈努力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前提。然而,必须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又有很多外界的因素制约了这种精神的发扬。

对于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来说,在职称的评定、住房条件的改善、孩子上学的费用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研究人员待遇普遍偏低的现象依然困扰着学术界。真正的学术作品没有出版社给出,受经济利益的诱惑,一些人围着出版社转,在不是自己所长的领域搞所谓的“畅销读物”。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作这种“短平快”的东西,不是作学问,但还是有人去做。这其中,不少人是为了名利,但也有的是出于“为稻粱谋”,不得已而为之。

在学问上“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应该是每一个学者的追求。但是,现在职称晋级、申请课题研究等等,都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而且和学者的待遇紧密相关,三、五年没有搞出成果,各方面都要受影响。因此,在反对学术界浮躁之气、倡导学者潜心作学问的同时,政策上有所鼓励也应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今天的社科学界,在老一代相继淡出之际,新的文化大家却依然无处寻觅。在为巨星陨落黯然神伤之际,我们同样期待,新一代能为学术的星空增添新的光彩。

参与和奉献：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职责

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不单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还应该为当代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些东西。面对当前的社会文化需求,有一个现实性极强的“任务”: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将我们解读和诠释古典文学名著名篇的著作从学术殿堂引向广大普通读者。在这方面,文学所有过很好的传统。老一辈的古典文学专家如钱锺书、俞平伯、余冠英先生等,当年就一方面坚持对于高深的、专门的学术课题的研究,一方面编写出版既有较高学术品位又有较大普及性和可读性的古典诗词选本。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俞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余先生的《诗经选》,以及集体编选的《唐诗选》等等,几十年来广为流传,是学界和广大读者公认的优秀读本。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继续向社会提供这样的文化精品。

目前社会上虽有欣赏唐宋名篇的热情,但由于商业炒作的影 响,使市场上充斥着不少假冒伪劣的读物,任意歪曲解说唐宋名篇,既糟蹋了优秀遗产,又贻害广大受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加紧工作,奉献精品,去“占领”阵地,正确引导群众的古典诗文鉴赏活动,提高他们的古典文学水平。

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人文建设,会促使我们原来的较为封闭的研究工作